

论清代词韵编订的兴起发展及其地位嬗变

杜玄图

(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四川 内江 641199)

[摘要] 作为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词韵编订的兴起源于清人复兴词学的诉求。清人复兴词学,首先着眼于词谱的编订,词韵编订不过是其附庸。随着词学研究的深入,词韵编订的地位才日渐重要。到了清代中晚期,词韵编订达到鼎盛,成为清代词学研究系统中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 清代词学;词学复兴;词韵编订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7)02-0083-05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Status Evolution of the Compiling of  
Ci Rhyme System in Qing Dynasty

DU Xuantu

(School of Literature, Neijiang Normal College, Neijiang, Sichuan 641199,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on Ci-ology in Qingdynasty, the rise of the compiling on Ci rhyme originated from people's wish of reviving Ci-ology in Qingdynasty. They focused on compiling the collected works firstly, so the compiling on Ci rhyme was just accessories. As the research on Ci-ology was deepened, the status of Ci rhyme compiling became more important. By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compiling of Ci rhyme reached its peak, and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system on Ci-ology.

**Key words:** Ci-ology in Qing dynasty; renaissance of Ci-ology; the compiling of Ci rhyme

词韵编订是清代词学的重要部分。词韵,即作词之韵,自词产生以来便存在,但对词韵的系统研究直到清代才出现,这与清代的词学发展背景有关。作为词学的一个分支,词韵编订在清代经历了由附庸到相对独立的演变过程。试论之。

一 清代词韵编订兴起的背景

有清一代,词学复兴。不仅词作数量众多,而且词学研究兴盛。一时间各类“词谱”“词话”“词籍校勘”“词选”和“词韵”作品蜂出。

词韵方面,清代以前的论词者很少谈及词韵。

词韵专书更是少见,文献有记载的不过四家:宋朱希真《应制词韵十六条》、南宋本《词林韵释》、明陈铎《词林要韵》一卷和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其中,朱希真《应制词韵十六条》早已亡佚,词韵内容无从考证。鲁国尧先生认为“此论实抄自清人戈载《词林正韵·发凡》”,最早源自康熙时沈雄所录陶宗仪语,然遍查陶氏作品,并无相关证据,故此说存疑。<sup>[1]</sup>“南宋绍兴二年刊本”《词林韵释》(又名《蓁斐轩词韵》),因韵部划分与《中原音韵》同,秦恩复认为当是元明之书,以入声配隶三声,与曲韵相似。阮元认为此书“盖后来曲韵之嚆矢”,<sup>[2]</sup>戈载、谢元

收稿日期:2016-11-21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清词‘尊体’思潮对清代中晚期词韵研究的影响”(16SA0077);内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清代中晚期的词韵研究及其学术思想源流”(15JC03)

作者简介:杜玄图(1987-),男,四川西充人,内江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音韵训诂和文献。

淮等皆认同此说。陈铎所撰《词林要韵》,今已失传,因“陈铎词曲兼擅,此书是否专为词韵尚不可知”。<sup>[3]335</sup>至于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平上去三声用曲韵,入声用诗韵,并非真正的词韵。此外,明程元初撰有《律古词曲赋叶韵统》十二卷,试图遍考诗赋词曲,“反复寻绎其音韵,证之古赋、近体,以至诗余、乐府,无不皆合”,认为各体用韵不过“独用通用”之别。该书虽论及词韵,但其中牵扯诗赋曲韵甚多,“驳杂不纯”,并非词韵专书。

到了清代,词作大量产生。然既无词谱传世,又无词韵专书指导,填词只能“考证旧词,知其句法平仄,参证同调之词,知某句可长可短,某字可平可仄而已”。<sup>[4]1827</sup>不得已的“尊体”思想下,词谱应运而生。康熙二十六年万树撰成《词律》二十卷,对其所见唐代至元代的词作进行分类,考订平仄及诸词调句法异同,“纠正《啸余谱》及《填词图谱》之譌,以及诸家词集之外异”。<sup>[4]1827</sup>康熙五十四年陈廷敬、王奕清等奉敕编撰《钦定词谱》四十卷,以万树《词律》为基础,纠正错漏,加以增订。《四库全书总目》誉之为“分判节度,穷极窈眇,倚声家可永守法程”。<sup>[4]1827</sup>此后涌现出大量词谱作品,多是在此二书基础上考订增减。如张履恒《词律补案》二十卷,钱国祥《式古堂词谱证异》五卷,无名氏《回文诗余图谱》不分卷,周祥钰、邹金生等辑《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八十一卷闰一卷,吕德本撰《词学辨体式》二卷,等等。据统计,清代词谱文献可考者达五十六种。<sup>[3]298</sup>

词谱专书的编撰,便于作词者“参证同调”,仿句式长短及字之平仄填词。但这种方法不过是“依葫芦画瓢”,实在笨拙。清人认识到“填词之大要有二:一曰律,二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二者并行不悖”。<sup>[5]</sup>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考虑从宋词中找出作词之韵,以便指导时人填词取韵,清代词韵编订的序幕由此拉开。

## 二 清代词韵编订的兴起和发展

### (一)“有无词韵”之争

清顺治五年,沈谦编成《词韵》,毛先舒括略并刊刻此书,名之《词韵略》。该书很快得到众人肯定,毛先舒赞其“不徒开绝学于将来,且上订数百年之谬”。今天看来,沈氏此书确实开启了清代词韵编订的先河,同时也引发了清人关于有无词韵的

争论。

一方面,有人认为“词本无韵”,否定总结宋词之韵和编撰词韵专书的做法。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一:“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通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至如入韵,则信口揣合方音俚响,皆许入押”,“词韵之了无依据,而不足推求。”<sup>[6]568</sup>《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仲恒<词韵>提要》:“考填词莫盛于宋,而二百余载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诗韵,或各杂方言,亦绝无一定之律。”<sup>[4]</sup>焦循《雕菰楼词话》:“毛大可称词本无韵,是也”,“按唐人应试用官韵,其非应试……不栩栩如律诗也。至于词,更宽可知也”,“皆用当时乡谈俚语,又何韵之有。”<sup>[6]3158</sup>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词韵”条:“宋元以来,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韵选之事。”<sup>[6]3599</sup>蒋兆兰《词说》“词林正韵”条:“宋人作词,未有韵本。然自美成而后,南宋词家通音律者,隐然有共守之韵。戈顺卿依据名家词,撰为《词林正韵》,近代词家,遵而用之,无待他求矣。独至押韵之法,趁韵者不论,即每逢韵脚处,便押一个韵,韵虽稳而不能使本韵数句生色,犹为未善也。名家之词,押韵如大成玉震之收,声容益盛,是亦不可不讲也。”<sup>[6]4632</sup>

在反对者看来:首先,宋代没有专门的词韵书或选韵指南。虽然在清代流传着一些“前代”词韵书,但多有可疑。这种质疑不无道理,“前代”词韵作品或是后人伪托之作,或是诗韵、曲韵间杂,或是亡佚,无从考证。其次,宋人作词用韵,或放宽诗韵而成,或以方音相谐,毕竟“当日所讲,在于声律,抑扬抗坠,剖析微茫。至其词则雅俗通歌,惟求谐耳”,故“绝无一定之律”。所以,词韵是“不足推求”的,后人没有必要总结词韵。

另一方面,清代更多的词学家对词韵持肯定态度。他们多是词作者,填词过程中,深感仅据词谱、词集“参证同调”之法的不便与不足,认识到词韵对于词作必不可少。因此,他们对否定派的观点予以反击,阐明词韵的重要性,并纷纷尝试归纳总结宋词之韵。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西河初不知宋词韵也,故为是言。”戈载《词林正韵》:“填词之大要有二:一曰律,二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二者并行不悖”,“毛氏论韵,穿凿附

会,本多自我作古,不料丧心病狂,败坏词学,至于此极。”<sup>[5]84</sup>江顺贻《续词品》“押韵”条:“毛氏历引旧词之失韵者为无韵之证……贻误后来不浅。”沈祥龙《论词随笔》云:“词贵协律与审韵,律欲细,依其平仄,守其上去,毋强改也。韵欲纯,限以古通,谐以今吻,毋混叶也。律不协则声音乖,韵不审则宫商乱,虽有佳词,奚取哉?”<sup>[6]4050</sup>孙麟趾《词径》:“作词尤须择韵,如一调应十二个字作韵脚者,须有十三四字方可择用。若仅有十一个字可用,必至一韵牵强。词中一字未妥,通体且为之减色,况押韵不妥乎。是以作词先贵择韵。”<sup>[6]2553</sup>陈锐《褒碧斋词话》:“学填词先知选韵,琴调尤不可乱填,如《水龙吟》之宏放,《相思引》之凄缠,仙流剑客,思妇劳人,宫商各有所宜,则知《塞翁吟》只能用东钟韵矣。”<sup>[6]4196</sup>

他们或从填词押韵的角度,或从作词用韵与词乐宫调内在联系的角度,阐发韵之于词的关键作用,批判毛奇龄等人否定词韵的观点。词韵专书的编撰提上了日程。

## (二)词韵专书蜂出

首先是沈谦《词韵》,全书近“百十余纸”,然因沈氏“苦于食贫,未能流布”。幸得毛先舒括略其书并收入《韵学通指》而流传于世,名曰《词韵略》。该书共分词韵为十九部,其中舒声举平以赅上去,共十四部,入声独立,另为五部。《词韵略》刊行后为世人推崇,成为“填词家之指南”。顺治十七年邹祗谟、王士禛所编《倚声初集》及康熙年间吴绮所编《选声集》,皆收录该书。康熙二十五年蒋景祁所编《瑶华集》及康熙二十七年徐鉉所辑《词苑丛谈》,亦附有《词韵略》一卷。万树《词律·发凡》评价道:“沈氏去矜所辑,可为当行,近日俱遵用之,无烦更变。”<sup>[7]</sup>在其影响下,此后出现了多种以之为准绳的词韵专书,如吴绮《词韵简》、仲恒《词韵》、郑元庆《词韵》、曹自《听绿窗词韵》、李文林《绿雪轩词韵》、无名氏《晚翠轩词韵》、戈载《词林正韵》和谢元淮《碎金词韵》等。这些词韵书大抵一脉相承,形成一个派系。

一个时代某项学术的兴盛不在于某派系一枝独大,而在于众多派系百家争鸣。除《词韵略》一系外,清代还出现了多种与之不合的词韵专书。

大体上有以下四类:(1)二十七韵部。李渔《笠翁词韵》四卷,多参考时音,分词韵二十七部,其

中舒声十九部,入声八部。(2)十五韵部。吴烺、程名世《学宋斋词韵》一卷,分词韵十五部,其中舒声十一部,入声四部。郑春波《绿漪亭词韵》不分卷、叶申芗《天籁轩词韵》一卷和钱裕《有真意斋词韵》一卷同为此类。(3)二十八韵部。许昂霄《词韵考略》,分词韵二十八部,其中舒声十九部,入声九部。列阴时夫《韵府群玉》一百〇六韵部,各部下注“今通”“今转”“古通”“古转”“借叶”之法。(4)三十五韵部。吴宁《榕园词韵》不分卷,分词韵三十五部,其中平声十四部,上去声十四部,入声七部。

## (三)“尚严”“从宽”之争

沈谦初创《词韵》,毛先舒赞其“不徒开绝学于将来,且上订数百年之谬”。但对韵脚的分合提出质疑,认为“沈氏词韵间有牴牾”。沈氏之后,继之论词韵者渐多,韵部分合多有不同,各家攻讦彼此分部之严宽。争论集中于两大类别:十九韵部类和十五韵部类。分十九部者,舒声(平、上、去三声)十四部,入声五部。分十五部者,舒声十一部,入声四部。两派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n)和(-m)韵尾韵的分合。“根据宋词用韵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语音应已开始打破这三者界限”,是以“三类分列者尚拘于韵书,比较保守,而三类合并的基本符合于旧词协韵的实际”。<sup>[8]</sup>

1. 尚严之词韵。清初,赵钥、曹亮武以沈谦《词韵略》为蓝本,编纂《词韵》。康熙年间,许昂霄作《词韵考略》,批评沈、赵、曹三韵“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分合之间,殊多可议。”

其后仲恒以沈氏《词韵略》为底本,作《词韵》二卷,沿沈韵分部之旧。《四库提要》批评该书分部曰:“平上去分十四韵,割魂入真軫,割哈入佳蟹,此谐俗矣。而麻遮仍为一部,则又从古。三声既真軫一部、侵寢一部、庚梗一部、元阮一部、覃咸一部矣。入声则质、陌、锡、职、缉为一部,真、庚、青、蒸、侵又合为一也,物、月、曷、默、屑、药合为一部,是文、元、寒、删、先、覃、盐又合为一也。”<sup>[4]1827</sup>认为其乃“沿讹踵谬,纠葛弥增”,“不俗不雅,不古不今”之作。

乾隆年间,吴宁作《榕园词韵》,分舒声十四部,入声五部。吴衡照称其“平声从沈氏,上去以平为准,入以平上去为准,最确。”嘉庆三年《白香词谱》所附无名氏《晚翠轩词韵》,分部与吴韵同。

道光元年,戈载《词林正韵》刊行。该书堪称清代词韵集大成之作,分舒声十四部,入声为五部。

戈氏言其编韵目的是“非敢正古人之讹,实欲正今人之谬,庶几韵正而律亦可正耳”,<sup>[5]35</sup>然后对前代词韵及词论一一评述。首先指出《词林韵释》为后人伪托曲韵专书,“近秦敦夫先生取阮芸台先生家藏《词林韵释》,一名《词林要韵》重为开雕,题曰宋棻斐轩刊本。而跋中疑为元明之季谬托,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诚哉是言也。观其所分十九韵,且无入声,则断为曲韵无疑。”<sup>[5]37</sup>然后指责沈谦《词韵》“又似纷杂,且用阴氏韵目,删并既失其当,则分合之界模糊不清。字复乱次以济,不归一类,其音更不明晰。舛错之讥,实所难免。”最后指出赵钥、曹亮武、李渔、胡文焕、许昂霄诸家分韵之误:“同时有赵钥、曹亮武均撰《词韵》,与去矜大同小异。若李渔之《词韵》四卷……以乡音妄自分析,尤为不经。至前此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平、上、去三声用曲韵,入声用诗韵,骑墙之见,亦无根据。近又有许昂霄辑《词韵考略》,亦以今韵分编……大旨以平声贵严,宜从古;上去较宽,可参用古今;入声更宽,不妨从今。但不知所谓古今者,何古何今,而又何所谓借叶?痴人说梦,更不足道。所幸者诸书俱未风行,犹不至谬以传谬。今填词家所奉为圭臬信之无疑者,则莫如吴焘、程名世诸人所著之《学宋斋词韵》,其书以学宋为名,宜其是矣,乃所学者皆宋人误处……而复有郑春波者继作《绿漪亭词韵》以附会之、羽翼之,而词韵遂因之大紊矣。”<sup>[5]38-41</sup>

杜文澜在《憩园词话》中盛赞戈韵“考订精详,洵可传世”,又谓“戈顺卿论词吴中,众皆翕服,惟长洲孙月波茂才麟趾与齟齬。”今未见孙氏论戈韵之语,但其《词径》中云:“词韵向无定本,惟沈去矜韵最妥,然失之太拘,且于通用兼收之处未经宣说明白。”

孙氏属于分韵从宽者,他认为沈韵之十九部失之在严,不料还有更“严”者。嘉庆年间许昂霄作《词韵考略》,他指出“尚严者谓诗变为词,诗用唐韵,词亦宜遵唐韵”,“好宽者谓词本无韵,方言里响,皆可任意取押”。认为“词韵通转当仿古韵之例”,故其韵分二十八部,其中平上去十七部,平声中又另列元、蒸二部,实即十九部,入声分九部。许氏主张词韵宜严,然其所分韵部与宋词实际用韵情况不符,所以指出“词家沿用者谓之今,合于唐诗者谓之古”,其分法实为诗韵而非词韵。

谢元淮《碎金词韵》晚出,属分韵尚严之列,韵

部划分完全遵照沈谦《词韵》。其《论例》云:“(沈谦)《词韵》三卷,每部俱总统三声,其中又明分平仄,凡十四部,入声五部,共为十九部。最为精切,今宗之”,又“平声十灰、十三元,上声十贿、十三阮,去声九泰、十卦、十一队、十四愿,沈氏皆割分其半,以声相属,源本《洪武正韵》,于填词尤为允当,今从之。”<sup>[9]</sup>

2. 从宽之词韵。乾隆年间,吴焘、程名世所撰《学宋斋词韵》刊行。该书词韵共分十五部,其中舒声十一部,入声四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称其“似仍非有所据而为之”。实际上,《学宋斋词韵》分韵乃归纳宋词所得,并非无所为据。

嘉庆年间,郑春波作《绿漪亭词韵》,为校改《学宋斋词韵》而成,二者分部相同,版式各异。刊行后,即为分部尚严者所垢病。胡薇元《岁寒居词话》称其“踳驳不可从”。陆葢《问花楼词话》认为该书“讹谬百端,去取寡当”。戈载更是批判道:“其书以学宋为名,宜其是矣,乃所学者皆宋人误处。”

道光年间,叶申芗《天籁轩词韵》刊行,其分部参照《绿漪亭词韵》,对郑韵十分推崇,就连韵字安排也以《绿漪亭词韵》为蓝本增补。

清代词韵“尚严”“从宽”之争,首先源自各家所据“旧词”(虽多称宋词,实际未必皆为宋词,亦未包含所有宋词)不尽相同。这与当时的条件有关,时人无法穷尽归纳所有“旧词”用韵,反倒各据“例外”之韵彼此责难。其次,不同词学观对韵部的取舍也有影响。比如,谢元淮认为“词为诗余”,词韵亦当诗韵之余,又主张“以曲歌词”“词宜入乐”,故其《碎金词韵》十九韵部之后另附“入声作平上去三声字”。而李渔虽多参考时音,但并无“以曲歌词”“词宜入乐”之主张,故其《笠翁词韵》二十七韵部中入声独立为八部。源于此,谢、李二氏在词韵编订上产生了“用旧韵”还是“用新韵”的差异,这和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和研究中“用旧韵”还是“用新韵”的“格律”之争是同一个道理。<sup>[10]</sup>

总的来说,清中叶以后,词韵编订的风气逐渐转向宁严毋滥,“十九韵部”基本成为诸家论韵的准绳。

### 三 清代词韵编订地位的嬗变

清代词韵编订盛况空前,但在清代,尤其是清

代前期,词韵探讨只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附产品。

一方面,关于“词韵有无”,只是时人讨论“词”之地位贵贱及尊体与否的顺带话题。“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sup>[4]</sup><sup>1827</sup>虽然清代词学研究盛极一时,但词的地位不过近于“俳优”罢了。再者,宋词之兴盛,主要在于“文”“乐”二体兼备,元明以降,词乐亡佚,词不再是合乐的综合艺术形态,只剩下空洞的文体形态存在。到了清代,已然成为“死掉”的文学遗产。清人认识到“词”已不再是当世学术的重心,正如焦循所言:“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柳苏晁,后则周吴姜蒋,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西崑、西江诸派,不过唐人之序余,不足评其乖合矣。”<sup>[11]</sup>务实的乾嘉学者多不愿将精力放在“空洞”的词学研究上。

另一方面,早期词韵专书大多附着在词话或词集作品之后配套刊行,很少有单行本。如沈谦《词韵略》初附刻于《古今词汇二编》,吴绮《词韵简》初附刻于《记红集》,李渔《笠翁词韵》初与《耐歌词》合刻,仲恒《词韵》初收于《词学全书》,郑元庆《词韵》初收于郑氏《三百词谱》,许昂霄《词韵考略》初附刻于《词林纪事》后,等等。大约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新出词韵专书才开始单独刊行,如吴烺、程名世《学宋斋词韵》有乾隆三十年单行本,吴宁《榕园词韵》有乾隆四十九年单行本,郑春波《绿漪亭词韵》有嘉庆十七年单行本,戈载《词林正韵》有道光元年单行本,叶申芑《天籁轩词韵》有道光十一年单行本,钱裕《有真意斋词韵》有道光二十一年单行本,另有曹自《听绿窗词韵》单独刊行,但未知具体刊刻时间。同时,此间仍有不少附刻本,如李文林《绿雪轩词韵》初附刻于《诗余协律》后(乾隆三十四年),无名氏《晚翠轩词韵》附刻于《白香词谱》后(嘉庆三年),谢元淮《碎金词韵》附刻于《碎金词谱》后(道光二十八年)。

直到后期,词韵作品才渐渐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词韵编订在清代前期一直是词学甚至是词谱、词集研究的附庸,随着词学研究的深入,其地位才日渐重要。

清代词韵编订的兴起,源于清人复兴词学的诉求。清人欲重现宋词之盛,编订各种词谱、词集,“参证同调之词”,仿句式长短及字之平仄填词。在作词过程中,时人深感词之“韵”和“律”的重要性。虽据词谱可依葫芦画瓢,仍不便于取韵填词,故而开始探索词韵以指导时人作词。清代词韵编订兴起的标志为沈谦《词韵略》的刊行及由此而引发的诸多争论,到清中期达到鼎盛。期间词韵专书蜂出,始终伴随着“有无词韵”和“尚宽”“尚严”之争。清中叶以后,词韵编订的风气逐渐转向宁严毋滥,“十九韵部”基本成为诸家论韵的准绳。然而,在清代前期,词韵编订只是词学研究的附庸,词韵专书只是词谱的附庸,随着词学争论的深入发展,词韵编订才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

#### 参考文献:

- [1] 鲁国尧. 鲁国尧自选集[M].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134-135.
- [2] 阮元. 揅经室外集:卷三[M]. 清道光三年文选楼刻本.
- [3] 江合友. 明清词谱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4]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 [5] 戈载. 词林正韵[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6] 唐圭璋. 词话从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7] 万树. 词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18.
- [8] 宛敏灏. 谈词韵:词学讲话之四[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4):84-94.
- [9] 谢元淮. 碎金词韵[M]. 刻本. 1848(清道光二十八年).
- [10] 彭敏哲. 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述评[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78-83.
- [11] 焦循. 易余籀录:卷十五[M].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责任编辑:黄声波